

兴登堡对德国法西斯政权 全面确立的影响

马廷中, 王秀伟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作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在希特勒上台和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完全确立方面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经历了由一定程度的限制到逐渐放松限制再到支持和鼓励的变化。兴登堡态度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兴登堡的阶级立场是根本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他的处境、个人矛盾的心理、自身的利益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则是具体的因素。

【关键词】兴登堡;德国法西斯;希特勒;纳粹党;影响

【中图分类号】K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42(2010)03-0064-05

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任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Hitler)为总理,法西斯政权开始在德国建立。然而自希特勒上台,仅一年半之久,德国法西斯政权就得以全面确立。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这是由多方共同促成的结果,如金融垄断资本阶层大地主、容克贵族的支持;军队的默许和袒护;民众受到欺骗和恐怖后的归顺;资产阶级传统政党的动摇和软弱;工人政党的分裂和失策等。但笔者认为身为总统的兴登堡在德国法西斯政权迅速全面确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深层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从希特勒上台到法西斯政权全面确立的一年半时间是兴登堡总统生命的最后时光。正是这短暂的一年半,兴登堡的言行举止对希特勒和纳粹党集权独裁统治的确立乃至德国以后的道路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这是由兴登堡当时的处境和复杂而近乎矛盾的心理所决定的。依笔者浅见,兴登堡对法西斯政权全面确立的影响是双重的,而且可以以《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的颁布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授权法》颁布前兴登堡态度的逐渐转变

《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又称为《授权法》。在《授权法》颁布实施前,即希特勒上台前后到1933年3月24日,兴登堡对希特勒由不完全信任到逐步信任,对希

特勒政府破坏议会民主制的政策由谨慎地限制到逐渐放松限制。虽然兴登堡和希特勒在政治上都倾向于民族主义,仇视“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①,对共和政体心存不满,但兴登堡对纳粹党同样没有好感,是“最不愿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人”^②。例如,在1932年7月31日大选,纳粹党(即民社党)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后,希特勒向兴登堡提出出任总理的要求,却遭到兴登堡的断然拒绝,这一事件足以看出握有实权的兴登堡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态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兴登堡对希特勒要求获得政权的独裁倾向的谨慎和警觉:“如果把全部政权交给一个政党,而且是一个片面对待不同思想者的政党,他不能向上帝、自己的良知以及祖国负责”。^③

11月16日国会大选后,德国垄断资本家、大容克地主代表联合致信兴登堡,请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虽然表示不反对希特勒争取到议会多数后组阁,但拒绝任命他为总统内阁的总理,实质上仍然是拒绝,因为当时兴登堡认为“民社党一再强调其‘独一性’,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总统内阁‘必然会导致一个政党独裁’,这就会大大增加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对立,因此他必须拒绝,否则他不能为其就职誓言及良心负责。”^④1933年1月初,组阁仅月余的施莱歇尔(Schleicher, Kurt von)因得不到国会多数的信任而使政府陷入困

【收稿日期】2010-06-26

【作者简介】马廷中(1964—),男,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王秀伟,男,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境,身处进退两难境地的兴登堡便默许前总理巴本(Papen, Franz Von)与希特勒秘密谈判,以此作为权宜之计。事实上,谈判在22日晚也取得了突破,但是直到26日兴登堡还在考虑不任命希特勒,而是考虑解散国会与推迟大选的可行性。当天,兴登堡在同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坦因(Hammerstein-Equord, Kurt Von)谈话时向后者保证,他无意任用“那个波西米亚下士(为总理)”^{[2]219}。由此可以看出兴登堡对希特勒及纳粹党上台前夕的冷淡态度,这也决定了兴登堡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后势必对其进行限制。

自1931年开始,希特勒坚持组阁的要求几次被兴登堡总统断然拒绝,这就在客观上直接延缓了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同时也给上台后的希特勒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为刚建立的法西斯政权设置了一些障碍。

兴登堡对刚上台的希特勒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内阁中多数人选是由兴登堡总统所决定的,特别是最大邦普鲁士邦总理由自己的亲信副总理巴本兼任;新的国防部长人选也由他决定;此外“国防军属于兴登堡的势力范围,为防止希特勒插手,他单独确定了陆军和海军中最主要的司令官人选,以致于希特勒几乎不认识国防军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3]232}。为限制希特勒的权力,兴登堡在他组阁前还专门立下约定,即总统不单独接见希特勒,只有在巴本副总理陪同下,才能听取希特勒的汇报和请示。虽然这些限制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也很快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突破,但对上台伊始的希特勒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嵌制和威慑作用。在最初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几乎无法迫使内阁接受他的意见,他只能在与巴本和胡根贝格(Hugenberg, Alfred)组成联盟时所约定的范围内行事,而这个范围是很狭小的”^{[3]235}。对兴登堡,上台之初的希特勒也表现出极其讨好奉承之态,“他出现时,总表现得像是兴登堡的小儿子;他想靠兴登堡神话这棵大树乘凉,他不断引用陆军元帅的某些‘命令’,在公开场合恭敬地、甚至带着奴态地讨好那位年迈的总统”^{[3]234}。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希特勒意识到兴登堡握有军权和随时可解散政府的权力才如此谨慎从事,没有一开始就在确立法西斯的道路上“急行军”。

尽管如此,在《授权法》颁布前的二十多天里,由于希特勒及纳粹党的伪装和蛊惑,兴登堡逐渐放松了对前者的限制,对希特勒政府的所作所为由监督和限制转为默许和纵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兴登堡在希特勒挟持内阁的要求下接连颁布或签署一系列法令,这无疑助长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破坏议会民主制的嚣张气焰。

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重新选

举,进而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因为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正是兴登堡要求将来在德国执政必需具备的前提”^{[3]240}。否则就可能像前几届内阁一样被总统颁布的紧急法令而解散。通过此举,希特勒还想壮大纳粹党在国会的势力,为以后废除民主制铺平道路。由于解散国会的意见符合了兴登堡的要求,希特勒在连续两次的内阁会议上冲破政治对手(主要指巴本和胡根贝格)的阻挠,迫使他们接受解散国会的意见。希特勒以内阁的名义向兴登堡提出请求,兴登堡对此欣然同意,于2月1日签署法令,解散了国会。由此可以看出兴登堡对希特勒“主动”行为的肯定。

尝到甜头的希特勒开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总罢工”特别敏感的希特勒一方面担心马克思主义各政党和工会联合起来以总罢工的形式反对新政府^②,另一方面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企图排挤国会中的共产党员而催促内阁讨论粉碎总罢工的法令。起草完法令,2月4日兴登堡就予以签署通过,不仅速度快,而且影响极坏,“这项居于一系列臭名昭著法令之首的并最终破坏德国一切言论自由的法令得以使中央政府清除其任何对手和批评者”^{[3]240}。事实确实如此,法令通过后,希特勒政府先后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也横加阻挠破坏,同时开始制造一连串的恐怖暴力事件。而这些肆无忌惮的行为正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利用了兴登堡所签署的《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法令》的庇护,从此开始有恃无恐,向法西斯独裁的顶峰迈进了一大步。

2月27日,纳粹党在戈林(Goring, Hermann)的精心策划下制造了嫁祸于德国共产党的“国会纵火案”事件,并将德共的威胁肆意扩大。在使人确信了这一“事实”后,希特勒于第二天就敦促兴登堡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根据法令,取消了魏玛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对某些罪行,包括“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2]276}。这样希特勒及纳粹党就可以以此为依据合法地逮捕共产党和他们的反对者,还可以以此为借口制造恐怖,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2]276},不得不将选票投给纳粹党及其盟友。由此可以看出这项法令的可怕后果。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Maumose, Hans)曾指出,这项法令使德国从此“迈出了走向希特勒无限制独裁的决定性一步”。^{[4]115}此时,并非没有人提醒兴登堡这一法令的严重后果,前总理布吕宁(Bruning, Heinrich)就宣称,他的中央党将反对任何推翻宪法的尝试,要求调查可疑的国会纵火案,呼吁兴登堡总统“保护被压迫者抵抗压迫者”。但这一呼吁毫无效果,兴登堡的态度却是保持沉默。^{[2]278}所以,由此足以看出兴登堡对此事的

恶性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取悦于兴登堡、民族主义保守派和军队,也为了表示自己的政府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者,希特勒特意将新国会的开幕选在3月21日的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③这令兴登堡大为感动。他在会上作了简单的演说,“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一辈青年中去,……,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12]281}从这几句演说中可看出兴登堡对希特勒政府的支持。在接下来希特勒的讲话中,他以奉承之词赞颂了兴登堡一番并走下讲台向后者深深鞠躬,紧紧握手,以致于感动得兴登堡热泪盈眶。这样,希特勒“出色”的表现成功骗取了兴登堡对他的信任。从当时在场的一位法国大使的日记中也可看出,“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要求的全部权力吗?”^{[12]281-282}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三天后的3月24日,兴登堡就在希特勒及其控制的内阁的要求下顺利签署了象征埋葬议会民主制的《授权法》。

二、兴登堡在《授权法》颁布后对法西斯政权确立的影响

《授权法》的颁布意味着魏玛宪法的取消。它成为法西斯独裁政府的全部法律基础,因为它不仅剥夺了议会的立法权,也部分剥夺了兴登堡掌握的签署法律的权力。^{[3]257}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兴登堡的约束,大大加快了德国法西斯政权确立的步伐。兴登堡这一举动的影响随着希特勒对《授权法》的滥用逐渐显现出来。

《授权法》颁布后,希特勒以此为据颁布各项法令。随着纳粹党影响的大增,兴登堡逐渐改变了对希特勒的看法,自动放弃了对希特勒权力的限制,使其能够在合法的外衣下放手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使纳粹党以外的其它政党无一例外地“自动”解散。这样就摧毁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支柱——多党制,实现了纳粹党的一党专政。在清除其它政党的同时,希特勒利用《授权法》两次颁布《各邦与帝国一体化法令》,逐步剥夺各邦的自主权。1934年1月30日《国家重建法》的颁布最终解散了邦议会,取消了各邦政府的自主权,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体化。此时的兴登堡非但没有以自己的权力和威望站出来阻止上述两项践踏民主制、走向法西斯独裁专制的行动,反而视之为纳粹党所取得的成就。1933年4月,兴登堡明确表示:“希特勒可以在没有巴本的陪同下单独晋见总统并汇报工作。”^{[4]116}这分明暗示了兴登堡对

希特勒独裁行为的妥协和纵容。

兴登堡对希特勒的纵容和“鼓励”在接下来的关于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公民投票中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体现。希特勒将德国是否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公民投票与清一色的纳粹党国会的选举定在同一天,即1933年的11月12日,其用意昭然若揭。^④从11月4日希特勒在布累斯劳的一次竞选会上的讲话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其中声称“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它的荣誉,而在15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他的荣誉。”^{[12]300}很明显,希特勒在充分利用民族感情,煽动民族主义复仇情绪。这最能为积压了15年不满情绪的大部分德国人所接受,也最能引起集“一战”前战争所带来的荣誉和“一战”战败后的痛苦于一身的老总统兴登堡的共鸣。以致在投票前的11月11日,兴登堡向全国作广播演说,呼吁德国民众“明天你们都要表示坚决的民族团结和对政府的支持。同我和国家总理一起拥护权利平等和光荣和平的原则,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已恢复了而且在上帝的帮助下将能够维持德国的统一。”^{[12]301}从兴登堡“振奋人心”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兴登堡不仅对前一阶段希特勒破坏议会民主制的法西斯独裁行为表示肯定和赞赏,而且对以后的希特勒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寄以莫大的希冀。兴登堡的言行和态度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欲望,使其得以在确立法西斯的道路上放开手脚地走下去。

这一阶段,希特勒看起来俨然已成为德国的最高独裁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通过了《授权法》,希特勒可以依此所欲为地颁布法令,兴登堡的地位大大削弱,但是我们还需看到兴登堡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始终握有指挥国防军的最高权力和解除总理职务的权力。希特勒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国防军与冲锋队的矛盾愈演愈烈时,为了得到兴登堡总统和国防军的信任与支持,他断然血腥清洗了曾经为自己上台立下“赫赫战功”的冲锋队。在这一事件的前后过程中,兴登堡的态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以冲锋队参谋长罗姆(Rohm, Ernst)为首的一部分冲锋队长们自1933年春天以来就提出“第二次革命”^⑤的口号,到1934年这种叫喊声已越来越响亮。包括兴登堡在内的保守的右派和军队坚决反对“第二次革命”,并要求希特勒制止并限制冲锋队的行为。1934年6月份仍在举棋不定的希特勒在得到了“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12]311}的消息。考虑到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他立即于6月30日毫不留情地对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进

行了清洗。由此,足以看出行将就木的兴登堡仍然对希特勒的决策有较大的影响。

1934年7月2日,在希特勒对冲锋队大屠杀进行了两天后,兴登堡就迫不及待地对希特勒“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危险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且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陆军在内阁中的代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Walter Blomberg, Von)代表内阁向总理祝贺,并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2]319-320}。兴登堡对希特勒一举清洗掉冲锋队的“果断”行为的褒奖和勉励使希特勒继续赢得了兴登堡的信任,这种信任体现在兴登堡没有把其临终遗嘱中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公开表示,而是作为私人信件交给希特勒,为希特勒继任总统创造了条件。另外,此举还博得了国防军的欢心和有力支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为国防军在兴登堡死后旋即表示效忠希特勒奠定了基础。所以,兴登堡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和影响不仅成为希特勒扫平内部忧患的动力,而且直接促成了希特勒登上德国的最高统治地位,为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最终确立铺平了道路。

德国法西斯政权确立的最后一步是希特勒在兴登堡逝世后接替总统职务,独揽一切大权。气数已尽的兴登堡最后所能做的只有在其遗嘱中对希特勒提出建议,希望他死后由王室复辟。但这毫无分量的遗嘱对于希特勒来说已如一纸空文,因为就在兴登堡逝世的前一天,希特勒就依据《授权法》拟定了一项《国家元首法》,为接替总统职位制造了法律依据。此外,遗嘱中关于兴登堡对希特勒的个人建议,希特勒也秘而不宣,拒绝公布。所以兴登堡遗嘱实际上没有起到丝毫的约束效果,反而另一份遗嘱中嘉许希特勒的内容被公之于众后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的人气。在8月19日对希特勒接替兴登堡职位的公民投票中,“合格选民中约有95%去投了票,其中有90%——3800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2]325}由此,希特勒成为德国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当国防军和内阁部长向他宣誓效忠后,法西斯独裁政权得以在德国完全确立。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从希特勒上台前后到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完全确立,兴登堡对希特勒及法西斯政权的影响经历了由一定程度的限制到逐渐放松限制再到支持和鼓励的变化。这种影响在按《授权法》颁布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的同时也存在着交互式的双重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影响下,法西斯政权得以迅速确立。

三. 对兴登堡双重影响的认识

那么在德国法西斯政权完全确立的过程中,兴登堡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兴

登堡对法西斯政权确立的双重影响?笔者认为归根到底应该是由兴登堡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兴登堡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就受到普鲁士黥武精神的熏陶。少年时期的军校生活使他树立了忠君报国的思想,特别是对普鲁士王室的感情在这一时期逐渐培养起来。从1866年到1918年近50年^⑥的军事生涯中,兴登堡从一个中尉军官到德军的最高统帅,见证了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军人的荣誉感和民族的优越感始终支配着他为国家效力,为德皇效劳。一战后,战败的德国外有协约国苛刻的压榨,内有各种政治势力波云诡谲地运动。此时,带有民族羞辱感的兴登堡投身政治,作为右派民族主义者,他坚定站在了垄断资本家、容克地主和军方一边。1925年,兴登堡当选第二任魏玛共和国总统后,德国国内形势急剧右转,各种准军事组织如“冲锋队”、“钢盔团”等得到迅速发展。1926年,在兴登堡的强烈要求下,德国政府将威廉二世和被废的诸侯们的财产全部归还他们,并赔偿因革命而遭到的损失。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兴登堡本人是典型的保皇派,是德国右派势力的代表,“虽身为共和国的总统,实际上却是反共和国势力的总代表”^{[5]42}。

正是由于这种立场,兴登堡才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一问题上不断妥协退让;在不触犯其底线的情况下,对希特勒破坏议会民主制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加以肯定和鼓励。另一方面,当罗姆的冲锋队与国防军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并危及到兴登堡和他所代表的右派的利益时,兴登堡“挺身而出”,要求希特勒及时限制冲锋队的专横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兴登堡的阶级立场决定着他对希特勒的态度。

此外,兴登堡对希特勒在确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过程中的双重影响还与兴登堡的处境和其复杂而近乎矛盾的心理有关。在希特勒上台前,兴登堡并不看好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是为稳定局势,“考虑流亡在荷兰的威廉二世的复位问题而希望纳粹党参加政府”^{[5]41},并非想让希特勒组阁。1930年德国总统制内阁刚开始实行,在任命总理的时候兴登堡肯定会先考虑自己的右派亲信和较有威望的人,如布吕宁、巴本、施莱歇尔,而不会考虑“过于夸夸其谈”的希特勒,所以一直到1932年底兴登堡都一再拒绝希特勒组阁的请求。

20世纪30年代初,羽翼日益丰满的希特勒及民社党在“纳粹运动”中已逐渐成为反对共和体制的急先锋,博得了大企业主和容克地主的信任。他们联名向兴登堡致信,请求授权希特勒组阁,实际上是在向兴登堡施压。此外,1932年底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是:所有政党都毫无例外地令人失望,经济似乎不再会繁荣,年迈的总统束手无策地不断更换总理。六百万失业者,工

业中在职工人只占全部工人总数的42.1%,在职职员只占全部职员总数的58.9%。^{[3]246}这些现实使兴登堡不得不考虑任命希特勒的可能性,于是在1933年1月初默许巴本与希特勒谈判,最终使后者得以组阁。

一方面,兴登堡对共和体制心存不满,但他身为共和国的总统,又不得不受到议会和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兴登堡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希特勒极端的民族主义行为不时地表示出赞赏的态度和近乎侥幸的心态,但又惟恐纳粹党实行独裁会加大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反抗。正是在这种相对矛盾的心理下,兴登堡起初对希特勒组阁加以谨慎的限制;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主义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逐渐放松乃至取消了对希特勒确立法西斯政权的行动的限制,转而予以支持。

我们在认识兴登堡对法西斯政权确立的影响时还必须正视兴登堡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身体状况。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已是垂暮之年的兴登堡对希特勒确立法西斯政权的约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也已力不从心。希特勒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得以蛊惑人心,骗取兴登堡的信任和支持。

至此,我们可以得知兴登堡对希特勒在确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中的影响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兴登堡的阶级立场是根本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他的处境、个人矛盾的心理、自身的利益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则是具体的因素,对兴登堡所持的态度和所施加的影响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注 释】

- ① 1919年后,兴登堡一直不承认德国在军事上被击败,而声称陆军是在停火后被德国革命“从背后暗算”的。1918年,参加过一战的希特勒也对战争结果不能忍受,认为德军并

没有在战场上战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所以两人都对当时被称为“十一月罪人”的革命派很仇视。

- ② 这种情况在德国历史上出现过,即1920年3月,自由团中一个名为埃尔哈特的上尉占领柏林,由极右派的沃尔夫冈·卡普担任总理,总统和政府仓皇逃跑,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后,才恢复了共和政体。
- ③ 这一天是俾斯麦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圣地,腓特烈的遗体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在此做过礼拜,兴登堡1866年第一次作为警卫军官来这里朝圣。
- ④ 1933年10月,希特勒解散了3月5日选举产生的国会,由于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民社党以外的其它政党均遭解散,所以11月选举的国会是清一色的民社党国会;在1918年的11月11日,德国签定《停战协定》,所以一战后德国人多将此视为国耻日。
- ⑤ “第二次革命”指以罗姆为代表的纳粹运动的激进分子在纳粹党摧毁了德国的左派后,要求将以大企业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和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为代表的右派通过继续的“运动”清算掉。
- ⑥ 兴登堡于1911年退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重新入役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前后共49年。

【参考文献】

- [1] 景德祥. 魏玛宪法二元制与希特勒的上台[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 (4).
- [2] (美)威廉·夏伊勒著,董天爵等译. 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 [3] (德)海因茨·赫内著,张翼翼,任军译. 德国走向希特勒独裁之路[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4] 吴友法. 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J]. 武汉大学学报, 1994, (6).
- [5] 林和坤. 略论希特勒攫取政权同德国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关系[J]. 南开学报 1998, (4).

(上接第28页)

- [8] 李先登. 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J]. 天津大学学报, 1985, (4).
- [9] 许进雄. 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7, 8, 12.
- [10] 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J]. 考古, 1972, (3).
- [11] 吴国桢著 陈博译. 中国的传统[M]. 台湾:东方出版社, 2000:42, 94.
- [12] 左传·昭公七年[M].
- [13] 翦伯赞著. 先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19, 199, 198.
- [14] Xiaoneng Yang: 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M]. Missouri Saint

Lou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89.

- [15] 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M]. 文物出版社, 1996.
- [16] 彭邦炯. 书契缺刻笔画再探索[J]. 选自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8:191-201.
- [17] 张晋藩总主编 蒲坚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191.
- [18] Brief an Bloch[M]. Vom 21/22.9.1890 MEW Bd.37:463-465.